

亲历申奥

梁丽娟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亲历申奥

梁丽娟 著



BEIJING 2008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申奥 / 梁丽娟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213-03674-3

I. 亲… II. 梁… III. 奥运会-申请-概况-中国
IV. G81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6421 号

书 名	亲历申奥	
作 者	梁丽娟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汪维玲	
责任校对	叶 宇	
封面设计	顾 页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2万	
插 页	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674-3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前言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北京被选定为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城市。7月15日,国际奥委会主要领导人拜会了到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会见时,时任国际奥委会总干事的卡拉尔说:“北京的申奥成功是中国的巨大胜利,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共同的胜利。1993年后,我目睹了何先生在国际奥委会中一块砖、一块砖地砌成了通向今天申奥胜利的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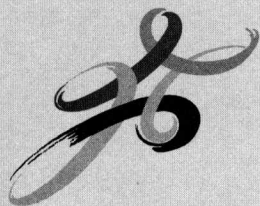
巍峨的中国万里长城逶迤在崇山峻岭中,这个世界奇迹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今天申奥胜利的长城也是几代人付出心血、共同艰辛努力的结晶。参与建造这长城的既有砌砖的,也有制砖、运砖的,还有组织、设计的……这当中既有千万名中国公民和海外同胞,也包括了许多外国朋友。

这本书是一位砌砖者亲历亲闻的记录,其中没有重要指示或红头文件,也没有豪言壮语和慷慨陈词。它只是砌砖者在接触到的范围内,力求真实地记录下来的申奥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和轶闻。

梁丽娟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序曲 / 1

从一百年前说起 / 2

经历曲折的发展 / 6

从“造反”到“委员” / 9

初识奥运会 / 14

进入夫人圈子 / 17

当委员夫人是门学问 / 19

亲历申奥大战 / 21

逐渐成熟的想法 / 25

先过亚运会这一关 / 27

第一次申奥 / 32

众盼奥运 / 32

从改变观念开始 / 33

巨人之争 / 37

北京第一次亮相 / 39

庄严而民主的选举 / 41

地中海畔鏖战急 / 44

小错会乱大谋 / 46

特殊礼遇 / 48

在阿卡普尔科陈述 / 51

进入决战年 / 58

交报告 待考察 / 60

走出去 / 62

请进来 / 64

到悉尼探营 / 66

风雪亚特兰大 / 69

90多把钥匙 / 72

莱蒙湖畔再较量 / 77

诽谤与尊严 / 82

申奥综合征 / 87

泄密风波和政治干预 / 90

“八国联军”和支持暖流 / 94

蒙特卡洛决战 / 97

“抵制”风波 / 101

记住这一天 / 105

理解万岁 / 116

间奏曲 / 119

锲而不舍 / 119

是否再申奥 / 121

主持文化委员会 / 124

疾风知劲草 / 127

积健为雄 / 131

申奥这门“行业” / 133

不朽的情谊 / 135

第二次申奥 / 140

一声春雷 / 140

请缨的曲折 / 141

倾情投入 / 144

从申请到候选 / 147

第一次口试 / 149

编写申奥报告 / 150

接待评估委员会 / 152

加强对外沟通 / 157

“滴灌”工程 / 159

得道多助 / 163

外界和对手的动静 / 166

选举新主席 / 169

莫斯科决战 / 170

难忘的较量 / 175

破纪录的投票结果 / 178

胜利的狂喜之后 / 181

过誉与厚爱 / 183



序 曲

2001年7月13日是个金灿灿的日子,是全世界所有炎黄子孙都极度兴奋狂喜的日子。生活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华夏儿女都能详尽地向你描述那天晚上是如何彻夜无眠地和周围的人欢庆中国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权的。

现在离2008年8月8日在北京举行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自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以来,我国参加了此后历届奥运会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特别是经过两次申办奥运会的各种宣传,全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都耳熟能详。如今这个曾经被人耻笑为“东亚病夫”的国家能举办地球上规模最大、最壮丽的体育盛会,人们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偌大的中国,几乎是每个人都想为办好北京奥运会直接、间接出把力。一个有13亿人口、5000年悠久历史和文化,同时努力向现代科技文明挺进的东方国家,以如此强烈的感情拥抱当代最盛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人用各自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传播奥林匹克精神,这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真是空前未有的壮举。

许多人形容中国取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权是“百年梦圆”。作为有幸基本上全程参与中国两次申奥的我们,许多感受是终身难忘的。有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想起来仍然会勾起激动的泪水,唏嘘不已。那些感人的往事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历程中的有机组成,我们将永远珍藏。但是,这些记忆不应仅仅留给我们自己,应该同时属于所有关心热爱奥林匹克事业的朋友。

要谈申奥,先得弄清楚何为“奥”,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中国同西方社会背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由于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个过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6—1948年,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阶段。第二阶段是1949—1979年,这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曲折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79年以后,自从中国经过长期艰难的斗争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

中的合法席位后,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不断作出积极贡献,包括这以后中国参加的多次冬季和夏季奥运会、中国委员进入奥林匹克运动领导层参与国际体坛的决策和领导,以及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和正在积极筹办奥运会等。

从一百年前说起

奥林匹克运动会曾经离我们很远,对它的认识过程非常漫长。从1906年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开始,至今已有一百年了。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租界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转载了英国伦敦一家报纸的专论,文中以一种傲慢的种族优越感蔑称:“夫中国——东亚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社会称为“东亚病夫”。这个屈辱的称呼陪伴了中国许多年。所以申奥,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后,也曾经是无人敢想的事。

自从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西方列强侵略并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开五口通商,允许西方列强在这些城市设立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腐败的清政府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打破了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西方的文明,包括教育制度和运动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

当时在封建统治者中出现了一批洋务派,他们主张改革内政、学习西洋,通过办工业、办新式学堂、编制新军等办法(即洋务运动)来挽救封建王朝。当时的新军学的是英、德、日式的兵操。洋务教育包括仿照外国或由外国人办学校,选派学生留洋。这时期的外国军人、商人、传教士和归国留学生都想把西方现代体育的竞技运动介绍到中国来,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更是起了先导作用。第一个在我国提倡体育的基督教青年会,于1895年在天津成立。1900年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次年在上海成立了青年会全国总会,将各地教会学校、各城市基督教青年会组合成一体,使上海成为西式体育活动领导中心。西方运动文化传入中国之后,逐渐取代了中国旧式的传统民俗体育。上海成为亚洲最早国际化的都市之一,成为西洋体育在我国较早的发源地。上海的外国侨民在1848年建立了跑马厅作为体育活动中心,里面逐步扩建了板球场,以及足球、网球、棒球、高尔夫等场地和游泳池。这个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跑马厅当年曾是上海外侨和上层社会的活动场所,解放后被辟为人民广场。当时上海还有少数教会学校以及清廷的新学堂设立了体育活动及体操训练的课程。

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的圣约翰大学)首次举办校内运动会,这是中



国最早的一次以田径为主项的正式运动会。这个运动会由加拿大教师组织,只有少数外籍学生参加,中国学生只是看热闹而已。此后圣约翰开始每年举行两次校运会,各地学校纷纷仿效举办本校的或校际的运动会。教会学校是西洋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举行的体育活动,不仅具有示范作用,也对中国人有启发作用。早期参加学校运动会、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的选手绝大部分都来自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了当时中国的各种体育活动,他们推动组织了最早的两届全国运动会,组团参加第一至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协助我国主办第二届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1922年,美国干事联合中国各地基督教青年会及体育团体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筹组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这个组织当即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内曾经有些文章说,1895年清政府曾收到过法国使馆转交的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信。这说法的出处是1933年一个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阮蔚村写的《中国田径小史》,书中写道:“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顾拜旦曾经致牒我李鸿章劝诱我参加首届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筹备会亦曾于1895年8月16日通过各国驻外的使馆转交了邀请书等……”还说“因为李鸿章不知田径为何物,所以无法答复”。这个说法曾经被一再引用。但这个说法的可信度是大有疑问的,因为至今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来佐证,何况作者当年几乎不可能查阅到清政府的或是国际奥委会的档案。首届奥运会只有13国331人参加,实际参赛的255人中还包括一些旅游者。除了欧洲10国外,还有美国、智利以及澳大利亚。不要说中国人对奥运会一无所知,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对奥运会也同样很陌生。

中国最早关于奥运会的报道是1906年出版的中文《世界》杂志。上面刊登了1906年在希腊举行的非正式奥运会的文章和图片,这在国内引起了一些热心体育人士的关注。1907年10月24日,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市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上就讲到:欧洲许多国家虽然获奖机会甚微,但仍然派选手去参加奥运会。他建议中国加紧准备,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

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饶宾森(美国人C. H. Robertson)在其工作报告中说,本年度中国体育界议论和关心的三个问题是:中国何时派出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举办奥运会的国际比赛?

1910年10月,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进会发起,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5个地区的140人参加了比赛。由于运动会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外国人组织的,一律用英语,参赛的运动员则身穿长衫马褂,大辫子缠绕在脖子上。有一

张历史照片,一个运动员在跳高时,他的长辫子飞扬在空中。参加全国运动大会这5个地区的中国和外籍负责人,组成3个全国性的临时机构,称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由上海委员会任执行机构。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中国奥委会)追认自己的前身是上述体育同盟会,至今国际奥委会仍把中国奥委会的成立时间定为1910年。

当年菲律宾有个传统,每年2月要举行嘉年华节,庆祝活动中也包括体育比赛活动,中国、日本都曾派选手参加。1911年菲律宾、日本和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外国干事共同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并决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远东各大城市举办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自1913年到1934年共办了10届,其中的1915年第二届、1921年第五届、1927年第八届都在上海举行。在远东运动会上,中国的足球得过9届冠军、排球得过5届冠军。远东运动会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以及奥运意识的增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了远东运动会及远东体协。后来由于日本侵略者打算把傀儡政权满洲国塞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坚决反对并退出,远东体协宣布解散,远东运动会也随之停办。

1912年至1927年,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体育被确立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育之一列入课程,用现代体育项目代替兵操,并开展了课外竞技运动。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负责人为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等,15名董事会成员全部是中国人。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体育事业不再由基督教青年会的外国人来办理了。协进会出版了会刊《体育季刊》,陆续加入了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中国奥委会。

从1906年到1948年期间,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加上天灾频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非常缓慢,体育水平也不高。协进会这个全国性体育组织和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解放前,中国总共参加过4届奥运会。

1. 1928年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当时国内“北伐”刚刚成功,政局尚未稳定,国内运动成绩也不理想,决定只派宋如海一个人作为观察员出席。宋如海是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被青年会送到美国春田大学学体育。他以中华民国副代表的名义去考察奥运会,并把自己的观感以书名《我能比呀》(英文奥运会即奥林匹亚特的谐音)写成《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这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奥运会的历史、组织、第九届奥运会的盛况,以及历届奥运会的成绩表等,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本关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文献。

2. 1932年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中日



战局紧张,中国曾经不打算参加。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密谋让两名东北运动员作为伪“满洲国”代表中国参加,消息传来,引起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慨。后来在张学良将军的大力资助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派出代表沈嗣良、选手刘长春、教练宋君复参加。他们三人在船上颠簸了25天才到达美国。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的预赛中就被淘汰了。

3. 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当时希特勒打算通过主办奥运会大力宣扬纳粹主义。国民党政府前所未有地派了69名运动员、34人的考察团前往参加。这是解放前中国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府拨专款17万元,社会各界也捐款支持。虽然在前一年就在国内组织了专门的选拔和训练,但是最后除了符保卢的撑竿跳以3.8米的成绩进入复赛外,其余项目在初赛便被淘汰。我国参加柏林奥运会代表团返国后不久,报纸上刊登了一张讽刺的图片。图片中在选手们面前的地上放了一只大鸭蛋,鸭蛋上面写着一行字“中国特制”,下面一行英文字的中文意思是“德国制造”,鸭蛋居中是一个颠倒了的五环。

4. 1948年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中国派出了53人的代表团。其中除了33名运动员和七八个体育人员外,“其余非商即贾”。所有项目都只参加了预赛。这次经费困难,靠全国体协到处募捐,仅足球队在出国途中为募捐就踢了35场球。奥运会结束后,一些头面人物去了美国,大部分运动员被困在海外。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和中国银行非但拒绝借款,也不肯为他们作保。多亏热心华侨的资助,运动员们才能返回家园。当时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一张漫画,画中是船上一群骨瘦如柴的中国运动员,他们高举双手托着一个庞大的“鸭蛋”回国。

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有3个中国人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讲究论资排辈,每个委员按其当选的时间编有一个顺序号。

第105号委员王正廷,1922年3月用通信方式选出。王正廷是中国著名外交家,推翻清政府后他曾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进会总干事,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内阁总理。1912年他在青年会任职时,支持并促成发起远东运动会。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举行时,他都任会长。1936年、1948年他两次担任中国参加奥运会代表团总领队。1956年辞职。在他任职期间,国际奥委会召开的33次全会中,他只参加过4次。

第184号委员孔祥熙,1939年6月选出。当时王正廷推荐他是因为孔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拥有财力。但是直到他1955年5月辞职,其间11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孔祥熙从未到会。他是国际奥委会中少数只挂名但从不参加会议的委员之一。

第205号委员董守义,1947年6月选出。董守义担任过多年体育系教授,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解放前他参加过两次国际奥委会全会,解放后代表

中国奥委会参加过4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他为维护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发展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58年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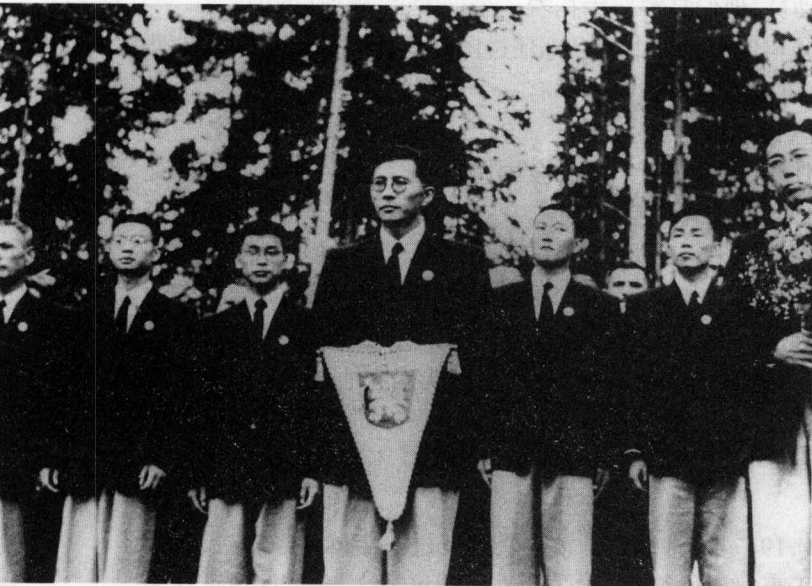
经历曲折的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这期间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斗争和艰难的较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建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它同时对外代表中国奥委会,197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才与中国奥委会分开。

当时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对新中国采取孤立、扼制政策,体育上也是一样。1952年2月,芬兰驻华公使向我外交部表示,芬兰政府希望我国派选手参加7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随即致电国际奥委会,表示决定参加这次奥运会。2月20日,我全国体总代表盛之白在奥斯陆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再次表达了我国体育组织的立场和愿望。

但当时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保守势力把持下,借口中国局势不明,拒绝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直到奥运会开幕前三天,还拒绝我国参加。经过我国以及苏联



何振梁(左三)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

委美国中，个品前和效天
育，自01月8日20:29，会
时均取单国个对出基

四届奥运会组委会委员和国
奥委会委员美国队个站
四科类训练，对台训练

奥队冬季不参加国际口人
中
1956年，何振梁(右
四)在罗马参加第七届
冬季奥运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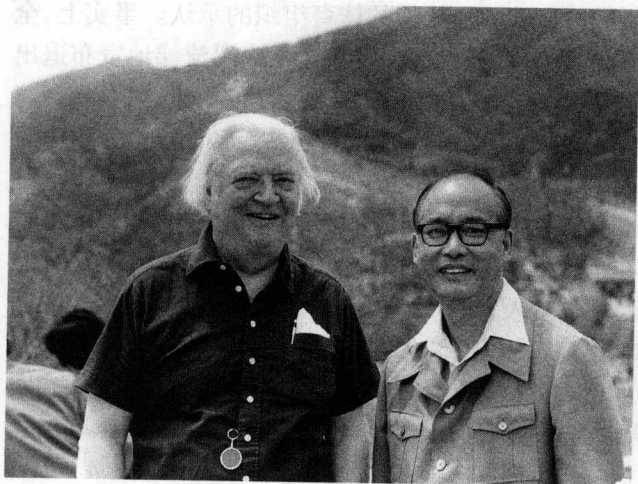
和东道国芬兰等国正义人士的斗争和努力，终于在奥运会开幕前两天，以多数票通过邀请我国运动员参加的决定。7月18日晚上，也就是开幕前夕，我国收到了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赫尔辛基市长佛伦凯尔的邀请电报。中国代表团一行40人(包括足球队、篮球队和一名游泳运动员)分乘三架小飞机日夜兼程飞了五天赶到赫尔辛基，在奥运会闭幕前5天赶到。这时奥运会许多预赛已经结束，只有吴传玉一个人赶上了参加100米仰泳预赛，他在预赛中破了全国纪录，这个纪录是中国运动员最早留在奥运会中的纪录。7月29日在奥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飘扬的五星红旗表明了中国具有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并愿为实现奥林匹克理想作出贡献。

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第50次雅典全会，以23票对21票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国奥委会。按当时《奥林匹克宪章》关于在一个国家只承认一个奥委会的规定，全会的决定意味着撤销对台湾当局扶植的体育组织的承认。事实上，全会的决定一经公布，台湾方面的代表已经在新闻发布会上痛哭流涕地宣布退出奥运会。但是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布伦戴奇未经任何讨论，擅自将台湾的奥委会以中华民国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在这以后的一系列会议上，董守义、荣高棠等人一再提出抗议，指出台湾的体育组织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组织，不能代表中国，严正要求国际奥委会改正错误。但是布伦戴奇却坚持错误立场。在一次给董守义的信中，他甚至说，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居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后来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布伦戴奇所持的是美国国务院的观点，甚至比美国(官方)还要亲台。”基拉宁在1979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还指出，在国际奥委会档案中确实查不到任何会议讨论过承认台湾“奥委会”的记录。当时有的国际单项体联也允

许台湾的体育组织占据中国的合法席位。在许多次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奥委会于1956年11月6日正式宣布不参加墨尔本第十六届奥运会。1958年8月19日,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从1958年到1973年,中国先后退出16个国际单项体协和一个亚洲体育组织。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但是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的恢复却延迟到1979年。1972年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和国际奥委会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基拉宁在他的自传《我的奥林匹克岁月》里专门就此写了一章。他写道:“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不能参加奥运会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他还说,自从他1952年当选为委员时就已知道中国奥委会的正式地址仍然在南京,没有任何通知说它迁到了台北。基拉宁主席和同样支持中国立场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先后在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访问了中国,商讨中国返回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途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海峡两岸之间三通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同一天,中美发表建交公报。根据新的形势,我国调整了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台湾问题的方针。1979年在蒙特维地奥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上,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明确表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一事实,只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代表全中国运动员的中国奥委会;考虑到台湾地区目前的状况,为了让台湾地区的运动员亦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可允许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湾(后经协商,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奥林匹克运动内,但它的旗、歌和章程应作相应的变动。中国提出的这个现实的解决方案得到许多人的赞同。1979年10月中旬,国际足球联合会决议重新接纳中国,用中国台北的名称称



1982年,何振梁与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基拉宁在北京。基拉宁在主席任期内,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做了大量工作。



呼台湾的组织。10月末,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会议决定,承认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同时台湾地区的体育组织在改名、改旗、改歌的前提下,国际奥委会也予承认。执委会采取通信的办法交由全体委员表决。11月通信表决的结果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决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在北京,设立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其新的会旗、会歌和会徽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批准。这就是以后大家所说的“奥运模式”。从此结束了长达21年的不正常局面,这不仅有利于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

1979年以后,由于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恢复正常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当年邓颖超同志在庆祝会上激情所言:“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上世界体育舞台。”这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正朝着日益光辉灿烂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为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迅猛发展。

从“造反”到“委员”

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恢复以后,需要尽快解决的是中国的委员问题。

1980年初,国际奥委会来信,要求我国就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提出建议,并把候选人的情况填表寄给国际奥委会。基拉宁建议我国提出三名候选人,并注明其中哪一名候选人最合适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经过国家体委党组讨论,中国奥委会提出荣高棠、牟作云、何振梁三人。荣高棠是新中国体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牟作云是美国著名以体育专长的春田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在体委长期担任司长职务。振梁虽有多年与国际奥委会打交道的实际工作经验、有较高的法语水平,也通英语,但是资历最浅,当然只能排在末位。这个决定上报国务院时,荣高棠正好出差在外,他返京后知道这个文件已经同外交部会签后报上去了。他坚决不同意把自己排在候选人的第一位。他向体委主任王猛以及党组其他同志提出,坚持说他本人年事已高,虽然早年在清华大学英语系学过英语,但多年未用,目前英语能听、能读,但是讲有一定困难。他觉得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内的委员,应该是能积极开展工作的人,既要有语言条件,更要有对外政策、国外体育事务等方面的广泛知识。荣高棠坚持把振梁放在第一候选人的位置,由于他的坚持,终于说服了体委其他领导人,把已经上报的文件从国务院

追回来重新起草后上报。最后中国奥委会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名单中何振梁是第一候选人。

中国奥委会的复信是1980年2月23日发出的,提出了三名委员候选人:何振梁、牟作云、马奇伟,并说明中国奥委会认为何振梁是最合适人选。之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莫斯科奥运会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所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在莫斯科全会上不讨论选举新委员,到次年巴登·巴登全会上再议。于是振梁在1981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在委员中的顺序号是333号。几年后,国际奥委会在一次查阅史料时发现多年前少算了一名任期甚短的委员,于是以此顺序下推,何振梁现在的编号是334号。

一个人一生会经历许多机遇。振梁幸运地有荣高棠这么一位伯乐另眼相看,竭力推荐,不拘一格地坚持把他提名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的第一候选人,使他能够在后来的国际体育舞台上发挥才能,在中国对外体育交往史上写下有价值的篇章。几十年来,何振梁总是对荣高棠这位老领导的知遇满怀感激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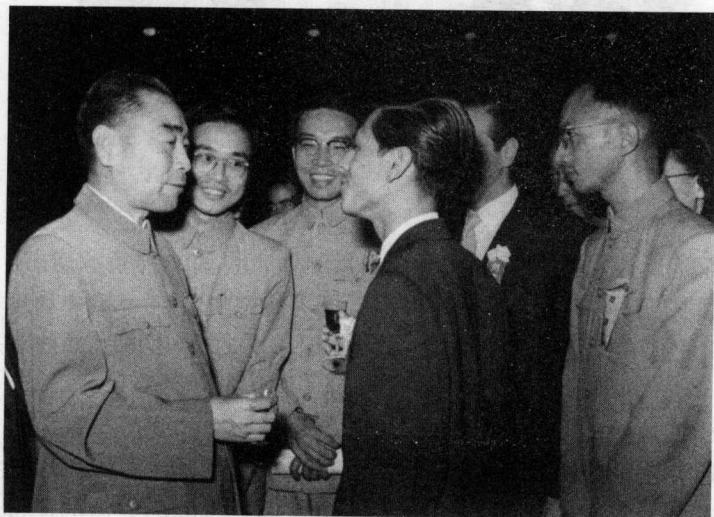
1963年,毛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何振梁为翻译。

振梁是在1955年调到国家体委的。1950年在他大学毕业前夕从上海的震旦大学电机系直接被调到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由于解放初期北京外事工作需要大量翻译人员,而振梁当时作为少数语文、政治条件都较好的法语翻译之一,在五六十年代不仅在团中央机关工作,而且常被“借调”去参加许多中央机关的重要外事活动。他曾多次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身边近距离接受到终身受益的教育,并且在一些重要党政代表团或国际会议的工作中,在政治和业务水平各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1955年2月他被调到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国际组,分管国际奥委会方面的工作。这以后他一直参与同国际奥委会以及其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打交道,从书信往来、文件起草到会内



外接触,在20多年里积累了大量对国际体育组织内的人与事等方面的了解。

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对振梁来说是他体育生涯的重大转折。在这以前的20多年里,振梁从事的体育外事工作主要是反对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错误政策,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绝大部分时间是处在与国际奥委会抗争的立场。20世纪60年代,他参与创立和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工作,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在国际体坛高举义旗,反对一些大国的霸道控制,也是处于与国际奥委会对立的地位。



1958年,在国际学联北京大会上,何振梁(左二)为周总理作翻译。

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大亚、非、拉国家取得独立之后,纷纷参加到国际体育事务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奥委会本身也有了变化,1972年结束了布伦戴奇多年来专制霸道、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时代,开始了以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当主席、逐步改革国际奥委会的时代。国际奥委会终于恢复了中国合法席位。1980年西班牙人萨马兰奇接任主席后,更是大刀阔斧着手改革。振梁经过与国际奥委会的多年抗争,现在进入到这个世界体育最高组织里,成为其中一名成员。他的一位好朋友曾经对他开玩笑说,如果你现在写回忆录,书名可以是“从叛逆到委员”。振梁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从过去争吵多年的冤家对头转变成为合作伙伴。但是他还是他,其坚持多年的原则立场没有变,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没有变。振梁是在国际奥委会改变了其过去错误做法后作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委员,为了致力于世界和平、人民友谊、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而被国际奥委会遴选进去的。

1982年5月下旬,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85次全会上,振梁宣誓就职。作为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庄严宣誓的第一个委员,他没有把宣誓看作是参